

國史館數位檔案 檢索系統之運用 ——以「行營」 研究為例

蘇聖雄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本文為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第4期研究生獎助計畫的研究成果，初稿發表於2011年7月20日「臺大數位典藏資料庫工作坊」（臺北）。對於臺大數典中心之獎助及劉維開教授之修改建議，謹致謝忱。

一、前言——兼述「行營」

2010年5月4日國史館與國立臺灣大學簽訂「數位典藏系統建置計畫」合作協議，希望將國史館豐富的數位資源由臺大進行系統的建置與維護，使國史館歷年來所建置的數位典藏資源於保存上更為安全永久，於應用上則更趨普及及有效率。該計畫由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負責執行，中心其後開發「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內容包括數位化後的總統副總統文物（如蔣中正總統文物、陳誠副總統文物）與一般史料檔案（如國民政府檔案、外交部檔案），共12個全宗、54餘萬筆目錄資料、570餘萬個數位檔案（統計至2011年9月21日，收錄範圍將不斷增加）。系統除了提供使用者對檔案進行較為傳統的關鍵字檢索、類別檢索，並可透過「後分類」的方式呈現更為多元的檔案資訊。（註1）2010年11月11日，國史館與臺灣大學舉辦「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發表會」，為此系統進行初步介紹，並於座談時提出展望。黃汎如，〈「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發表會」紀實〉一文，已對該會作介紹，藉此吾人可了解系統之特點與使用方法。（註2）本文以實際研究——「行營」研究為例，探討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對推展該研究之幫助，尤其將焦點集中於「後分類」之運用，嘗試從「實際操作」層面，提供研究者使用該系統之參考。

本文所指稱之「行營」，概指國民政府時期建立之正式軍事機構，主要為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國民政府設立此一機構，最早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時任陸海空軍總司令的蔣中正，在北伐底定之後，於各重要據點設立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以此機構統轄各地軍、政事務。九一八事變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進行組織調整，總司令行營撤銷，改為各綏靖公署，蔣隨即下野。1932年初，蔣氏復出，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於1933年2月7日開始籌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1933年5月21日，軍委會南昌行營成立，以熊式輝為行營主任，是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之最早設置。此機構為當時全國最大的軍事組織，統一指揮對中共的軍事行動，及為日後與日本全面交戰進行軍事整備，蔣氏尚且長期親駐指導。隨著國民政府剿共、抗日等軍事行動之推展，蔣中正若在若干重要城市或地區，陸續組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代表中央政府對各部隊行使管轄指揮之權，計有武昌、重慶、石家莊、西安、天水、桂林、昆明、成都、漢中、北平、東北、西北等行營。1946年5月，軍事委員會取消，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改稱國民政府主席行轅，（註3）下設若干「綏靖公署」，統一指揮對中共之軍事行動，及綜整管轄區域內之民政。（註4）1948年5月19日，以蔣即將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國府主席職撤銷，各地行轅改為綏靖公署或歸併入各地剿匪

總司令部，（註5）至此，行營（行轅）之設置全部結束。

國民政府統治時期設置的行營（行轅）責任區域廣大，且管轄範圍不僅限於軍事。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法定「處理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軍事及監督指揮剿匪區內各省黨政事務」，（註6）實際上更管理「江西、福建、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蘇、山東、陝西十個省及上海、南京、漢口三個特別市，以及軍事委員會所屬的軍政部、參謀部」。（註7）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有節制川、滇、黔、康四省政軍經之大權，其成立不僅象徵中央勢力更進一步侵入西南，也代表蔣以軍事權凌駕行政體系（行政院），對於擴大其軍事專權舉足輕重」。（註8）又如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天水行營，主管第一、第二、第五、第八、第十、魯蘇、冀察各戰區業務，（註9）考量一個戰區管轄區域動輒數省，可知天水行營管制地域極為廣闊。查找當時報刊對行營之記載，亦可發現行營幾乎無事不管，如1937年8月14日以重慶金融恐慌，於委員長行營召開三行經理會議；（註10）如1937年9月19日，重慶行營籌組川省貿易局；（註11）又如防疫、（註12）房市、（註13）人口疏散、（註14）民眾動員、（註15）賑災、（註16）匯率等皆為其管轄範圍；（註17）更甚者，電影院是否放映國旗及元首肖像，亦在行營管制之列。（註18）

行營（行轅）之設置，與國民政府統治

時期相始終，且管轄範圍極為廣泛，在民國政治軍事史中無疑十分重要，且既然此為中央派駐地方之首要軍事機構，將其設置歷程作一綜述，應可對整個中央、地方關係獲得貫串了解。職是之故，本文以此為主軸，尤其將注意力集中於設置時間較長的「行營」，將其與「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結合，申論該系統對推進行營的研究有何幫助？討論關鍵字、後分類檢索成果對於行營研究有何刺激？資料庫提供的功能是否足以協助研究獲得新發現？並進一步反思資料庫對於行營研究的資料整理，有什麼具體貢獻，又有何侷限。

二、行營研究對「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之運用

坊間並無任何貫串行營之專書、論文，即便只提到單一行營之論著，亦十分稀少，（註 19）故行營研究之材料除了相關回憶、日記、報刊，較集中於檔案史料。國史館所藏檔案，與行營研究相關者所在多有，多數收入「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茲概述如下。

（一）「行營」相關檔案概述

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目前收錄 12 個全宗檔案之中，《蔣中正總統文物》、《閻錫山史料》、《陳誠副總統文物》、《國民政府檔案》、《資源委員會檔案》、《汪兆

銘史料》、《外交部檔案》、《蔣經國總統文物》（依筆數排序）等 8 個全宗收有行營相關資料。

《蔣中正總統文物》（蔣檔）原存於大溪頭寮賓館的「大溪檔案室」（外界因此有稱其為「大溪檔案」者），該機構蒐羅及典藏蔣中正相關資料檔案，進行整理分類，也為部分檔案撰寫重要事件始末。1995 年該檔案移轉至國史館，現已完成數位掃描作業。經過關鍵字檢索，與行營相關之檔案目錄約 2,295 筆，其中以「特交檔案」、「特交文電」系列所收最豐。

《閻錫山史料》為國民黨政要閻錫山留存之史料，計有 105,958 筆目錄資料。由於閻錫山長期掌握山西省軍政大權，與行營相關人士往來電報甚多，留存資料乃較豐，相關資料約達 553 筆。

《陳誠副總統檔案》為陳誠所留存之個別資料。陳十分重視個人資料的保留與整理，設有「石叟資料室」，保存參與國政的重要史料。其亦曾親自口述平生經歷，經秘書整理彙編而成《石叟叢書》。這批史料獲陳誠家屬同意後，2005 年捐贈國史館典藏。陳誠為蔣中正手下要員，素有「小委員長」之稱，曾任東北行轅主任（前身為東北行營），故其留存資料，與行營相關者所在多有。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所收《陳誠副總統檔案》15,805 筆目錄資料，其中與行營相關者約 98 筆。

《國民政府檔案》收錄 1925 年 7 月

至 1949 年 6 月國民政府及總統府的檔案，共 7,086 卷，詳實記錄有關國家重大決策之制定與指令。與行營相關之檔案目錄約 42 筆，雖數量不多，但每筆資料頁數不少，且不乏行營組織檔案，如〈行營組織法令案（一）〉、〈行營組織法令案（二）〉，總頁數高達 352 頁，含括 1935-1946 年之行營組織大綱修正案，內容豐富。

《資源委員會檔案》收錄該委員會成立以來（包括前身）之相關檔案，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收錄 27,985 筆目錄資料，與行營相關者約 17 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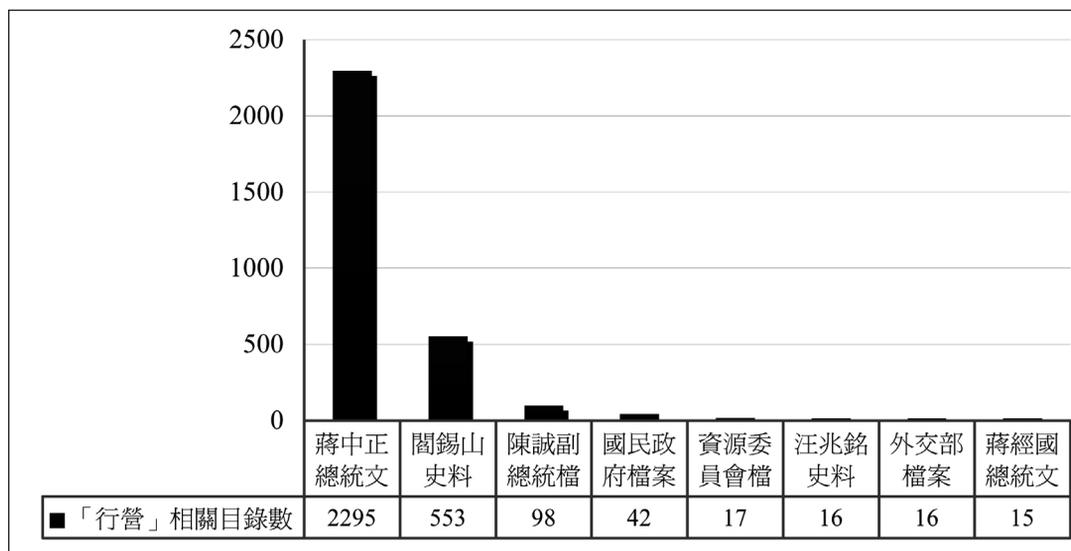
《汪兆銘史料》原由法務部調查局保管，2005 年移轉國史館典藏，數位化後文

件史料建置 3,459 筆目錄資料，5,500 餘頁影像圖檔。與行營相關者，計 16 筆，全為汪兆銘另立國民政府後所設之行營資料。

《外交部檔案》係 1975-2004 年間由外交部移轉至國史館之外交相關檔案，檔案年代起自 1893 年（清光緒 19 年），迄於 1998 年，目前仍進行整理、掃描作業，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收錄 8,649 筆目錄資料及 72 萬餘頁圖檔。與行營相關之目錄，計 16 筆。

《蔣經國總統文物》為 1990、1995 年由陳立夫及總統府轉移之蔣經國相關文物，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收錄 10,366 筆資料。因蔣經國戰後曾至東北辦理中蘇交涉，

表 1 各全宗檔案「行營」相關件數



（表格製作 / 蘇聖雄）

故與本研究相關檔案目錄皆與東北行營相關，共 15 筆。

加總 8 個全宗與行營直接相關的目錄資料，共計 3,052 筆。若加計其他與行營間接相關的資料，如行營下轄軍隊的軍事行動電文、行營相關人員的動態（如南昌行營祕書長楊永泰）等資料，資料當多達一倍以上（詳見表 1）。

（二）後分類之運用與呈現情形

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可提供傳統資料庫的關鍵字查詢，亦可進行「後分類」檢索，此為其最大特色。以下敘述關鍵字之建置及呈現情形，並探討「後分類」提供研究者的新訊息為何。

我們以「行營」作為關鍵字鍵入系統，可得 3,055 筆目錄資料。直接除去（在檢索欄位鍵入「-」）「銀行」、「營業」、「營救」等字詞，得 2,993 筆，但這樣做可能刪到如「行營營業」之類的資料，故我們仍以 3,055 筆資料為觀察對象。其中 1 筆為《嚴家淦總統文物》「協助該行營業部」之檔案（1980 年），2 筆為《謝東閔副總統文物》關於「臺灣銀行營業廳」的照片（1974 年），與行營無關，故皆除去毋論。我們將第一層後分類設為「檔案年代」，可看到各年代的檔案分布數目（如表 2）。

1911 年為辛亥革命的一年，當時應無行營之組織，我們考察系統呈現的這一則檔案目錄，可知曉此《外交部檔案》與 1945-

表 2 「行營」關鍵字分布表

| 西元紀年 | 民國紀年 | 檔案目錄數 |
|-------|---------|-------|
| 1911 | 民國前 1 年 | 1 |
| 1923 | 民國 12 年 | 3 |
| 1925 | 民國 14 年 | 2 |
| 1926 | 民國 15 年 | 28 |
| 1927 | 民國 16 年 | 26 |
| 1928 | 民國 17 年 | 51 |
| 1929 | 民國 18 年 | 258 |
| 1930 | 民國 19 年 | 179 |
| 1931 | 民國 20 年 | 175 |
| 1932 | 民國 21 年 | 9 |
| 1933 | 民國 22 年 | 242 |
| 1934 | 民國 23 年 | 398 |
| 1935 | 民國 24 年 | 653 |
| 1936 | 民國 25 年 | 144 |
| 1937 | 民國 26 年 | 184 |
| 1938 | 民國 27 年 | 105 |
| 1939 | 民國 28 年 | 68 |
| 1940 | 民國 29 年 | 49 |
| 1941 | 民國 30 年 | 7 |
| 1942 | 民國 31 年 | 30 |
| 1943 | 民國 32 年 | 23 |
| 1944 | 民國 33 年 | 3 |
| 1945 | 民國 34 年 | 117 |
| 1946 | 民國 35 年 | 167 |
| 1947 | 民國 36 年 | 6 |
| 1948 | 民國 37 年 | 1 |
| 1949 | 民國 38 年 | 1 |
| 1962 | 民國 51 年 | 6 |
| 未注錄年代 | | 116 |

1946年間東北行營相關，由於後設資料中的「相關年代」顯示「1911〈民國前1年〉」，系統乃將之呈現在1911年，實則談到行營，與是年並無關聯。而1962年政府已遷臺十數年，亦應無行營這種組織，觀察該年6筆資料，是為《陳誠副總統文物》中《剿匪戰史》的相關記述，或因該書出版於1962年，故檔案日期註記於是年，實際上當年與行營亦無關係。1923年行營初次在檔案中出現，此是為《蔣中正總統文物》中，孫文特任蔣中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註20）

我們可將檔案目錄分布年代，以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內建之長條圖觀察（如表3）。透過長條圖，我們可以注意到行營相關檔案目錄的年代分布概況，有四個高峰，一為1929-1931年，一為1933-1935年，一為1937年前後，一為1945-1946年。當中

尤以1935年為最高。這樣的分布，提供研究者一個切入點，進一步探究分布狀況何以如此？

我們接著可將後分類第二層設定為「相關地區」，並觀察歷年分布（如表4）。

經過整理，可大略明瞭與行營檔案相關

表3 檔案目錄分布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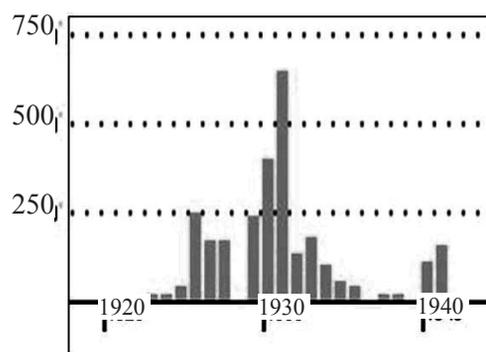


表4 後分類「相關地區」出現最多次數區域之按年代分布情形

| | | | |
|--------------|---------|--------------|---------|
| 1923 民國 12 年 | 廣東 | 1936 民國 25 年 | 南京 |
| 1925 民國 14 年 | 廣東 | 1937 民國 26 年 | 南京 |
| 1926 民國 15 年 | 廣州 | 1938 民國 27 年 | 重慶 |
| 1927 民國 16 年 | 湖北 | 1939 民國 28 年 | 重慶 |
| 1928 民國 17 年 | 南京 | 1940 民國 29 年 | 重慶 |
| 1929 民國 18 年 | 北平 | 1941 民國 30 年 | 雲南 |
| 1930 民國 19 年 | 南京 | 1942 民國 31 年 | 重慶 |
| 1931 民國 20 年 | 南京 | 1943 民國 32 年 | 雲南 - 昆明 |
| 1932 民國 21 年 | 漢口、南京 | 1944 民國 33 年 | 重慶 |
| 1933 民國 22 年 | 江西 - 南昌 | 1945 民國 34 年 | 重慶 |
| 1934 民國 23 年 | 江西 - 南昌 | 1946 民國 35 年 | 北平、重慶 |
| 1935 民國 24 年 | 湖北 - 武昌 | | |

(表格製作 / 蘇聖雄)

的地區分布，若進一步將歷年出現最多的區域做整理，可以發現，地區分布大致呈現北伐前在「廣東」，北伐時隨著時間從「廣州」到「湖北」到「南京」，再及於「北平」。北伐後以「南京」為主，1932年又出現「漢口」。1933-1934年以「江西南昌」為主，1935年為「湖北武昌」，1936-1937年復為「南京」。1938-1945年以「重慶」為主，間或出現「雲南昆明」。戰後則為「重慶」、「北平」。以上這些呈現狀況，有甚麼意義？它代表著甚麼？此亦提供研究者另一研究課題。

我們還可以將後分類第二層設定為「相關主題」，並觀察歷年主題分布情形。

北伐前似以「調遣部屬」為主，北伐時以「人事」、「經費」、「補給」為主，北伐後1929年以「情報」、「人事」為主。1930年爆發「中原大戰」，戰後1931-1936年以「剿匪」、「情報」、「軍事經費」為主。1937-1941年以「抗日戰爭」為主，1942-1944年以「情報」為主。對日抗戰後，1945-1946年以「東北接收與淪陷」為主。以上整理呈現與行營相關的主題，似亦呈現當時行營主要業務，這些都可進一步探詢。

我們嘗試將後分類第二層設定為「相關人員」，觀察相關資料之呈現（如表5）。

委員長行營即蔣中正的行營，歷年以「蔣中正」出現次數最多，可為吾人輕易理解。至於其他人員出現次數的變動，代表著

甚麼？是否代表行營業務的主要執行者（如1929-1930年的何成濬）？是否為行營處理事情之對象（如1929年的馮玉祥）？又是否可呈現蔣中正人際網絡之變遷？這些都值得進一步探究。

以上是我們將後分類第一層設定為「檔案年代」，第二層設定為「相關地區」、「相關主題」、「相關人員」所呈現的狀況，及延伸出的課題。實際操作上，我們還可將後分類延伸到第三層進行觀察，亦可調換順序。如此不同的排列組合及呈現，或可發掘更多未注意到的問題，提供研究者一些刺激。

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尚有一「隱藏」技術—「綴詞」檢索，該技術方開發完成，之後系統改版時計畫以更簡單的介面呈現。我們初步嘗試將「綴詞」檢索與行營研究結合，看看是否有新的發現。

在檢索欄位輸入：「?termpat.:{2,3}行營」，如此可以檢索出「□□行營」、「□□□行營」等「行營」左方的綴詞（前綴詞）（如表6）。

透過綴詞檢索，吾人可挖掘檔案中關於行營的相關關鍵字，並知曉其筆數。我們亦可將綴詞檢索範圍擴大，鍵入：「?termpat.:{2,10}行營」，以之檢索「□□行營」（左方2個綴詞）至「□□□□□□□□□□行營」（左方10個綴詞）（如表7）。

表 5 後分類第一層檔案年代、第二層相關人員之呈現情形

| | | | |
|---|---|---|--|
| 1926 民國 15 年 [28] 蔣中正 [18] 李濟琛 [5] 鄧演達 [4] 孫傳芳 [3] 譚延闓 [3] | 1927 民國 16 年 [26] 蔣中正 [17] 朱紹良 [8] 陳銘樞 [4] | 1928 民國 17 年 [51] 蔣中正 [31] 何應欽 [8] 白崇禧 [6] 朱培德 [6] 楊杰 [6] | 1929 民國 18 年 [258] 蔣中正 [94] 何成濬 [68] 唐生智 [43] 閻錫山 [41] 馮玉祥 [33] |
| 1930 民國 19 年 [179] 蔣中正 [61] 何成濬 [35] 何應欽 [21] 閻錫山 [19] 劉峙 [15] | 1931 民國 20 年 [175] 蔣中正 [73] 何應欽 [25] 劉峙 [18] 楊虎城 [15] 何成濬 [15] 李鳴鐘 [15] | 1932 民國 21 年 [9] 蔣中正 [5] 劉峙 [2] | 1933 民國 22 年 [242] 蔣中正 [134] 何應欽 [37] 林蔚 [32] |
| 1934 民國 23 年 [398] 蔣中正 [239] 何應欽 [71] 劉湘 [62] 蔣鼎文 [59] 陳誠 [52] | 1935 民國 24 年 [653] 蔣中正 [411] 何應欽 [110] 張學良 [109] 顧祝同 [108] 楊永泰 [108] | 1936 民國 25 年 [144] 蔣中正 [102] 顧祝同 [32] 陳誠 [23] 張學良 [19] | 1937 民國 26 年 [184] 蔣中正 [113] 顧祝同 [35] 何應欽 [27] 陳誠 [20] |
| 1938 民國 27 年 [105] 蔣中正 [71] 蔣鼎文 [14] 陳誠 [13] 張羣 [13] | 1939 民國 28 年 [68] 蔣中正 [40] 程潛 [22] 白崇禧 [8] 蔣鼎文 [7] | 1940 民國 29 年 [49] 蔣中正 [39] 程潛 [16] 白崇禧 [12] | 1941 民國 30 年 [7] 蔣中正 [3] 何應欽 [2] |
| 1942 民國 31 年 [30] 蔣中正 [11] 汪兆銘 [8] 楊揆一 [7] | 1943 民國 32 年 [23] 蔣中正 [11] 汪兆銘 [8] | 1945 民國 34 年 [117] 蔣中正 [76] 蔣經國 [34] 熊式輝 [30] 李宗仁 [21] 龍雲 [15] | 1946 民國 35 年 [167] 蔣中正 [133] 陳誠 [34] 熊式輝 [27] 程潛 [17] 張發奎 [16] |

說明：年代後面數字表示檔案件數；人名後面數字表示出現次數。例如：民國 15 年 [28] 表示此年有 28 件檔案，蔣中正 [18] 與李濟琛 [5] 表示在此 28 件檔案中各別出現 18 次與 5 次。

表 6 前綴詞字數 2-3 檢索結果

| | |
|-------------|------------|
| 委員長行營 [185] | 漢口行營 [14] |
| 南昌行營 [132] | 東北行營 [13] |
| 北平行營 [52] | 廣州行營 [13] |
| 蔣中正行營 [44] | 熊式輝行營 [12] |
| 總司令行營 [33] | 電武昌行營 [12] |
| 電南昌行營 [27] | 司令部行營 [11] |
| 由南昌行營 [23] | 正南昌行營 [11] |
| 電重慶行營 [21] | 西安行營 [10] |
| 武昌行營 [10] | |

表 7 前綴詞字數 2-10 檢索結果

| | |
|-----------------|------------------|
| 南昌行營 [132] | 武漢行營 [7] |
| 委員長行營 [84] | 何應欽電告閻錫山南昌行營 [7] |
| 北平行營 [51] | 軍委會委員長行營 [7] |
| 漢口行營 [13]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 [7] |
| 廣州行營 [13]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東北行營 [6] |
| 東北行營 [13] | 蔣中正電熊式輝行營 [6] |
|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 [11] | 政府主席蔣中正與昆明行營 [5] |
| 西安行營 [10] | 總司令部行營 [5] |
| 武昌行營 [10] | 蔣中正於南昌行營 [5] |
| 蔣中正電南昌行營 [9] | 蔣中正電各戰區長官各行營 [5] |
| 蔣中正電重慶行營 [9] | 劉湘電委員長行營 [5] |
| 陸海空軍總司令行營 [8] | 保定行營 [5] |

由此足以知曉檔案目錄中的行營通常怎麼稱呼，並清楚其筆數。例如，各行營時常不冠設置地名，如南昌行營、武昌行營有時在電文中僅稱「委員長行營」，這些都可以透過綴詞檢索為吾人所了解。

除了左方的綴詞可供查索，我們亦可查詢右方的綴詞（後綴詞）。在檢索欄位鍵入：「?termpat: 行營.{2,3}」，可檢索行營右方 2 至 3 個字的綴詞（如表 8）。

經過右方綴詞檢索，我們對於檔案目錄中行營相關機構、職務之稱呼、筆數，有清楚的了解。進一步點入這些檢索結果，可以明瞭該單位之相關業務、作為。

若跳脫行營研究來看，綴詞檢索還可讓我們輕易了解相關人物之間的業務往來次數。例如，我們在檢索欄位鍵入：「?termpat: 蔣中正電.{2,3}」（「電」或可改為「電令」、

表 8 後綴詞字數 2-3 檢索結果

| | |
|------------|------------|
| 行營參謀處 [86] | 行營軍法處 [17] |
| 行營第一處 [75] | 行營電蔣中 [16] |
| 行營第一廳 [62] | 行營電何應 [15] |
| 行營第二廳 [41] | 行營主任等 [13] |
| 行營辦公廳 [34] | 行營主任顧 [13] |
| 行營經理處 [28] | 行營主任李 [12] |
| 行營政治部 [26] | 行營政訓處 [11] |
| 行營參謀長 [24] | 行營電朱培 [11] |
| 行營秘書長 [20] | 行營陸軍整 [10] |
| 行營副主任 [20] | 行營指揮 [10] |
| 行營電軍事 [20] | 行營主任 [10] |

「電示」、「電告」、「電詢」、「電囑」、「令」、「手令」、「指示」、「條諭」、「條示」等），經過篩選，便可檢索出蔣中正拍電報給相關人士之次數（如表 9）。

於此可以清楚看到蔣中正較常發電報給誰，認識蔣之業務往來。另外，吾人或可據此進一步延伸，探究蔣的人際關係。

軍事單位的檔案目錄數量，吾人亦可藉由綴詞檢索輕易呈現。如我們在檢索欄位鍵入：「?termpat: 第.{1,3}軍」，經過篩選，可得各「軍」在檔案目錄中的出現次數（如表 10）。

「軍」級番號的綴詞檢索，使吾人清楚知曉各軍在檔案中的比重，以此或能延伸探究各軍在民國時期之歷史、重要性。我們

表 9 「蔣中正電」後綴詞 2-3 字檢索結果

| | |
|---------------|---------------|
| 蔣中正電何應欽 [854] | 蔣中正電賀耀組 [152] |
| 蔣中正電閻錫山 [740] | 蔣中正電汪兆銘 [139] |
| 蔣中正電宋子文 [538] | 蔣中正電白崇禧 [130] |
| 蔣中正電何成濬 [330] | 蔣中正電賀國光 [125] |
| 蔣中正電熊式輝 [308] | 蔣中正電陳銘樞 [120] |
| 蔣中正電朱培德 [285] | 蔣中正電衛立煌 [114] |
| 蔣中正電顧祝同 [262] | 蔣中正電馮玉祥 [112] |
| 蔣中正電張學良 [246] | 蔣中正電傅作義 [108] |
| 蔣中正電孔祥熙 [229] | 蔣中正電李宗仁 [107] |
| 蔣中正電蔣鼎文 [193] | 蔣中正電曹浩森 [106] |
| 蔣中正電胡宗南 [188] | 蔣中正電徐永昌 [106] |
| 蔣中正電陳濟棠 [178] | 蔣中正電張治中 [106] |
| 蔣中正電韓復榘 [161] | 蔣中正電錢大鈞 [104] |
| 蔣中正電朱紹良 [153] | 蔣中正電唐生智 [103] |

表 10 「軍」級番號綴詞檢索結果

| | |
|-------------|-------------|
| 第一軍 [753] | 第十二軍 [176] |
| 第三軍 [728] | 第三十軍 [173] |
| 第五軍 [728] | 第二十六軍 [169] |
| 第四軍 [587] | 第二十五軍 [155] |
| 第二軍 [391] | 第二十八軍 [145] |
| 第八軍 [387] | 第十三軍 [142] |
| 第七軍 [352] | 第十五軍 [133] |
| 第九軍 [325] | 第十四軍 [132] |
| 第十八軍 [304] | 第五十四軍 [131] |
| 第十軍 [279] | 第五十二軍 [124] |
| 第六軍 [216] | 第四十軍 [114] |
| 第二十九軍 [185] | 第六十七軍 [109] |

也可以以同樣的方法，檢索「戰區」、「軍團」、「路軍」、「師」、「旅」、「團」等軍事層級。要之，透過綴詞檢索的各種變化，對研究之刺激及效率之提高，不啻有甚大之幫助。

三、資料庫對「行營」研究的具體貢獻及侷限——代結語

探討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對行營研究之貢獻，實包含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為國史館數位典藏的豐富程度，即其所典藏資料的質、量。第二個層次為檢索系統的功能、後設資料的完整程度，及後分類呈現的意義。

就第一個層次來說，國史館館藏史料豐富，已數位化的史料亦日漸增多，而《國民

政府檔案》、《蔣中正總統文物》等重要史料皆已數位化，故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所收資料之質與量，無庸置疑。與行營直接相關者已達 3,000 餘筆，若加計其他無法以關鍵字直接探勘之檔案，數目極為龐大，而其中不乏已整編過的卷宗，如《國民政府檔案》中的〈行營組織法令案（一）〉、〈行營組織法令案（二）〉、〈軍事委員會各行營行轅官員任免（一）〉、〈軍事委員會各行營行轅官員任免（二）〉、〈軍事委員會各行營行轅官員任免（三）〉、〈南昌行營官佐學員名冊〉，《蔣中正總統文物》的〈中央機關組織（一）〉（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前敵行營編組職權大綱及編制表）等。

就第二個層次來說，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對行營研究，最基本的貢獻在提供一般資料庫亦有的關鍵字檢索。由於國史館數位典藏關於行營的檔案十分豐富，透過關鍵字檢索獲得的檔案目錄亦十分可觀。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對行營研究之進一步貢獻，在提供「後分類」檢索。如前文所述，後分類檢索足以呈現一些僅透過關鍵字檢索無法呈現的資訊，由此產生一些不同以往的檢索結果，進一步刺激研究者探詢相關問題。例如，前文所述透過後分類觀察，行營檔案目錄數在 1935 年達到高峰，其緣故為何？若我們對此一課題進行研究，似可提出下列可能答案：1935 年南昌行營結束，武昌行營正在組建，爾後隨著國軍追剿共軍，其他行營陸續建立起來。1935 年可說是軍

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開始廣泛設立之「起點」，相關檔案、電令因此較多，乃有行營檔案目錄數在 1935 年達到高峰之情狀。（註 21）由此可見後分類之呈現，不僅僅顯示一種檔案的數量多寡，對於行營歷史之研究，或亦有其意義。又如，上述後分類「相關地區」按年代分布情形表格（詳見表 4），若我們詢問其意義，似可提出可能答案：這個表呈現蔣中正為核心的權力中心之「轉移」與「彈射」（或說「影響」）。如 1923-1929 年期間，呈現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勢力之擴張，由廣州「轉移」至武漢再「轉移」於南京，最後國府勢力一度「彈射」及於北方。1930-1934 年期間，則呈現蔣之重心由南京（首都）「轉移」至武漢（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再「轉移」至南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1934-1938 年期間，則呈現共軍「長征」以後，蔣取消南昌行營，另行組建武昌行營，故中心由南昌「轉移」至武昌。西安事變之後，重心「轉移」回到南京，其後隨著對日抗戰，重心「轉移」至重慶。1938-1945 年期間，呈現蔣的「影響力」進入雲南。1945-1946 年期間，則呈現蔣的「影響力」及於華北。

要之，後分類檢索提供研究者一些新的刺激，在觀察後分類結果的過程中，或可帶來一些靈感，於是資料庫便不只是資料查索的工具；研究者不只是從資料庫摘取東西，亦與資料庫互動。在這個過程，透過資料詮釋開發新的研究議題，激盪出新的研究成

果。

至於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之侷限，筆者提出下列幾點討論。

第一、後設資料（metadata）問題。這個問題包括後設資料的完整程度、後設資料格式是否統一。前者舉例來說，《蔣中正總統文物》的後設資料內容，「籌筆」系列中並無「相關地區」之記註，以致我們嘗試用後分類顯示「相關地區」之時，只會顯示“none”，無法進一步觀察，也使我們將國史館數位典藏與行營相關的全宗一致用「相關地區」後分類觀察時，無法看到籌筆的任何一件檔案目錄，遺漏甚多。以後者來說，我們觀察《蔣中正總統文物》中的「相關地區」後分類之時，地區標註並不統一，有些會加省級，有些只寫城市，如「江西-南昌」跟「南昌」，竟分開呈現，這應是後設資料在建檔時格式不一所致。上述問題將導致吾人在觀察後分類結果時，有所割裂或闕漏而不完整。

第二、資料比重問題。國史館館藏資料極其豐富，但每一年收錄的檔案量不可能是「均勻」的。關於某件事的檔案可能較多；有些事即便重要，也可能受種種因素影響而檔案收錄較少。這種狀況，將影響我們對後分類結果的分析。例如，前述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檔案目錄中，行營相關目錄數量於 1935 年達到高峰。若檔案收錄大抵是「有多少收多少」，那麼上述的分析或許成立（即 1935 年為行營活動之高峰）；若檔

案收錄不甚規律，那麼我們觀察到 1935 年的狀況，可能只是表示當年的「檔案留存較多」而已。或許 1937 年行營運作更為頻繁，只是相關檔案收錄較少。又如上述依「相關地區」後分類呈現的表格之意義，是否真實代表蔣氏權力之「轉移」與「彈射」？還是只是呈現一種資料比重而已？這都值得商榷。

第三、資料性質問題。本文所謂「行營」，是指一種制度化的機構，與孫文、國民政府、蔣中正相關，但有些「行營」是一種暫時性機構、稱呼，如蔣中正臨時到前線去，有時該地亦稱「行營」，不見得是一常駐機構。（註 22）此外，行營不見得是蔣中正的行營，其他軍事將領到前線駐紮，亦可稱之。（註 23）就常駐機構言之，汪兆銘於 1940 年另立之國民政府，亦設有「行營」這種組織，雖亦為制度化機構，但已非重慶國民政府的行營。（註 24）將以上不同性質的行營，用後分類一同呈現在一平面數字上，其所代表的意義混雜，勢必影響解讀與分析。對於後分類的相關地名、相關人員亦有這種狀況。相關地名可能是行營所在地，可能是行營業務對象的所在地，可能是行營獲得情報的所在地，極其複雜。相關人員可能是行營人員、與行營交涉的人員、行營獲得情報所指涉的人員，亦可能是政府要員而與行營無直接關係，極其龐雜。將這些性質不同的資訊以後分類呈現，如將立體壓縮為平板，所能見到訊息不見得更多，反而可能

產生誤解。如何剔除這些變數，建立更有觀察價值的後分類檢索系統，是吾人必須面對的課題。

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對行營研究無疑有甚大助益，其收錄檔案資料豐富，除了傳統的關鍵字檢索功能，又提供後分類檢索，給予研究者不同角度的觀察與刺激。該系統雖仍有其侷限，然數位化為未來歷史研究之趨勢，吾人不應因此而排斥，反而應「化『侷限』為『無限』」。國史館與臺灣大學走在浪潮上不斷摸索、前進、改進，令人肯定。

【註釋】

1. 〈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發表會 11/11 〈四〉〉，《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網站》，<http://www.digital.ntu.edu.tw/news.jsp?flag=63#63>，連結時間：2011年7月4日。〈國史館與國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系統建置計畫」合作協議書簽署儀式〉，《國史館數位典藏計畫網站》，http://dft.dnh.gov.tw/event_17.htm，連結時間：2011年9月16日。「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網址為：<http://ahara.digital.ntu.edu.tw/>。
2. 黃汎如，〈「國史館數位檔案檢索系統發表會」紀實〉，《國史館館訊》第6期（2011年），頁125-138。
3. 當時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
4. 劉國新主編，《中國政治制度辭典》（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1990年），頁387、391。
5. 張憲文、方慶秋、黃美真主編，《中華民國史大辭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2年），頁727-728。
6. 蔡鴻源主編，《民國法規集成》第三十三冊（合肥：黃山書社，1999年），頁398-399。
7. 謝藻生，〈我所知道的南昌行營〉，《世紀行》第一期（1995年），頁36。
8. 楊維真，〈蔣介石的地緣關係〉，收入呂芳上策畫，《蔣介石的親情、愛情與友情》（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公司，2011年），頁216。
9. 陳長河，〈國民黨軍委會天水行營組織概述〉，《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上海），頁89-93。
10. 《中央日報》（重慶），1937年8月14日，版2。
11. 《中央日報》（重慶），1937年9月19日，版3。
12. 「西安積極防疫行營召開防疫會議」，《中央日報》（重慶），1938年7月3日，版2。
13. 「行營組織房屋評定會限制高抬房價」，《中央日報》（重慶），1938年9月27日，版3。
14. 「行營公布辦法疏散渝市人口」，《中央日報》（重慶），1938年10月2日，版3。
15. 「動員渝市民眾，行營將擬具組織法」，《中央日報》（重慶），1938年10月4日，版3。
16. 「各地紛紛救災，監察院同仁捐一日所得，廣州行營飭屬節米施賑」，《中央日報》（南京），1946年6月8日，版2。
17. 「關內外通匯，行營經委會頃決定辦法，匯率由中行隨時牌示」，《中央日報》（南京），1946年8月17日，版4。
18. 「電影院放映國旗，不合規定格式行營函請市府糾正」，《中央日報》（重慶），1938年11月30日，版3。
19. 如周開慶，〈重慶行營史話〉，《暢流》46：11（1973年），頁8。陳長河，〈國民黨軍委會天水行營組織概述〉，《軍事歷史研究》1996年第3期（上海），頁89-93。陳方南、陳學知，〈從東北行營到東北剿總〉，《社會科學戰線》2003年第1期（長春），頁277-278。萬建強，〈國民黨南昌行營秘錄〉，《黨史文苑》2004年第3期（南昌），頁16-19。張瑞德，〈運籌帷幄：黨政軍調查設計委員會與南昌行營的政策制定〉，收入《走向近代》

- 編輯小組編，《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臺北：東華書局，2004），頁 329-349。
- 王才友，〈抗戰前國民黨政治犯感化政策的分析——以南昌行營臨時感化院為個案〉，《政大史粹》第 19 期（2010 年），頁 1-44。程維、熊援生著有《南昌行營》一書，該書對南昌行營之描述甚為完整，並有一定史料基礎，但終究非學術著作。參見氏著，《南昌行營》（南昌：江西美術出版社，2007）。
20. 「孫中山特任蔣中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1923 年 1 月 16 日），〈革命文獻——北伐目的及準備與蔣中正就職誓師〉，北伐時期，《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20100-00001-001，入藏登錄號：002000000293A。
 21. 經劉維開教授提醒，我們似亦可將此現象推論為當時中日雙方有意調整彼此間的關係，故相關資訊、指示藉由行營傳遞者達到一個高峰，行營相關檔案目錄乃大為增加。
 22. 如「閩錫山電馮玉祥等據確報蔣令在駐馬店覓行營地點週內守祕」（1930 年 9 月 2 日），〈討論黨國大事軍事案（十）〉，文件 電報 要電錄存，《閩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1-0090-222，入藏登錄號：11600000028A。又如「蔣中正電陳儀皖行營派憲兵或軍委會衛隊服務」（1932 年 6 月 12 日），〈親批文件——民國二十一年五月至民國二十一年六月〉，特交文卷，《蔣中正總統文物》，典藏號：002-070100-00025-073，入藏登錄號：002000000887A。
 23. 如「徐源泉電周蔭寰本軍大部已移天岳擬在岳口設行營除參謀外一律回漢」（1932 年 6 月 27 日），〈各方民國 21 年 6 月往來電文錄存（二）〉，文件 電報 各方往來電文原案及錄存，《閩錫山史料》，典藏號：116-010108-0206-039，入藏登錄號：116000001258A。
 24. 如「周佛海簽聞日方現地部隊有主張設嵯縣者似不必設行營可設招撫使之類尤不可由鈞座兼任」（日期不詳），〈周佛海致汪兆銘函件（三）〉，文件 函電與函件，《汪兆銘史料》，典藏號：118-010100-0033-084，入藏登錄號：118000000048A。又如「汪兆銘電楊揆一就職湖北省主席並武漢行營屆期宣讀之監誓電文及舊幣交換之佈告及咨文八月一日送出」（1942 年 6 月至 1942 年 8 月 7 日），〈民國三十一年汪兆銘與楊揆一等函電〉，文件 函電與函件，《汪兆銘史料》，典藏號：118-010100-0039-031，入藏登錄號：118000000023A。